

Eighty Years of
Archaeology at Liangzhu

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

朱叶菲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朱叶菲
著

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

良渚文明丛书

Liangzhu Civilization Series

Eighty Years of
Archaeology at Liangzh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 / 朱叶菲著.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7 (2019. 8重印)

(良渚文明丛书)

ISBN 978-7-308-19180-7

I. ①良… II. ①朱… III. ①良渚文化—文化遗址—研究 IV. ①K87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2553号

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

朱叶菲 编

出品人 鲁东明

策划人 陈丽霞

丛书统筹 徐 婵 卢 川

责任编辑 曲 静

责任校对 程漫漫 杨利军

装帧设计 程 晨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08千

版 印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180-7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总序 Preface

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刘 斌

时间与空间真是奇妙的组合，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浩瀚的宇宙，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仿佛恒久不变地镶嵌在天幕中。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光年是距离单位，宇宙深处星星点点射向我们的光线，来自遥远的过去。原来，时空的穿越，不过是俯仰之间。

考古，同样是这种俯仰之间的学问，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时光之门，将我们带回人类历史中每一个不同的瞬间。而距今 5000 年，就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放眼世界，5000 年前是个文明诞生的大时代。世界上的几大流域，不约而同地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 年前的中华文明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学界甚久。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文明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器……我们逐一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似乎到出现了甲骨文的商

代为止，便再难往前追溯了。

考古学上，我们把文字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在中国的史前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在辽阔版图的不同地理单元中，就开始演绎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然而，中国的史前时代长久以来被低估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夏商为文明探源的出发点，以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无形中降低了周围地区那些高规格遗迹遗物的历史地位，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随着探源脚步的迈进，我们才渐渐发现，“满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良渚”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个案。

大约在53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尚玉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尽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广受尊崇，但在此时却达到空前的繁荣。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那些至高无上的人被埋葬在土筑的高台上，配享的玉器种类一应俱全，显示出死者生前无限的尊贵。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这些玉器的拥有者是良渚的统治阶级，他们相信自己是神的化身，行使着神的旨意，随葬的玉器种类和数量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等级和职责范围。我们在杭州余杭的反山、瑶山，常州武进的寺墩，江阴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极高等级的墓群。这就似乎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割成不同的统治中心，呈现出小邦林立

的局面。然而，历史偏偏给了余杭一个机会，在反山遗址的周围，越来越多的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这种集中分布的遗址群落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使得考古工作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稳步开展。到今天再来回望，这为良渚文明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否则，谁会想到零星发现的遗址点，竟然是良渚古城这一王国之都的不同组成部分。

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是一个有 8 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6.3 平方公里）。它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其规格已绰绰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其实，只要打开思路，我们会发现，通行的文明标准不应成为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那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经走过了 80 多个年头。从 1936 年施昕更先生第一次发现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质工具开始，到今天我们将它定义成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早期国家的区域文明；从 1959 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到今天我们对良渚文明进行多领域、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良渚的国家形态愈发丰满

起来。这一系列丛书，主要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致力于良渚考古的中青年学者，围绕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集体编纂而成，内含极其庞大的信息量。其中，包含有公众希望了解的良渚古城遗址的方方面面、良渚考古的历程、良渚时期古环境与动植物信息、代表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墓地的反山王陵、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良渚高等级玉器、供应日常所需林林总总的良渚陶器……还有专门将良渚置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的中外文明比对，以及从媒体人角度看待良渚的妙趣横生的系列报道汇编。相信这套丛书会激起读者对良渚文明的兴趣，从而启发更多的人探索我们的历史。

可能很多人不禁要问：良渚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在近现代历史的观念里，我们是华夏儿女，我们不知道有一个“良渚”。其实，这不难理解。我们观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汉唐延续至今的，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国家文明，是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考古学界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的就是了解最初的文明是怎样的形态。因此，我们不该对最初的文明社会有过多的预设。在距今 5000 年的节点上，我们发现了良渚文明是一种区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区域，辽西可能存在红山文明，长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为考古发现的局限，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文明形态是否真实。良渚文明在距今 4300 年后渐渐没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却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及九州。由此可见，区域性的文明实际上有全局性的影响力。

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区

域性的文明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我们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 1000 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礼制规范、等级社会模式、城市架构等文明因素不断地传承、交汇，直至夏商。其实，夏商两支文化也是不同地区各自演进发展所至，夏商的更替，其实也是两个区域性文明的轮流坐庄，只是此时的区域遍及更大的范围，此时的文明正在逐鹿中原。真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要从秦朝算起。这样看来，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万万不可将之割裂。

2019 年 5 月于良渚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施昕更与《良渚》

- 一 吴越史地研究会 002
- 二 施昕更与《良渚》 011

第二章 “良渚文化”的命名

- 一 湖州钱山漾和邱城遗址 026
- 二 1959年夏鼐命名“良渚文化” 033
- 三 苏家村出土半片玉琮 039

第三章 良渚遗址群和“文明曙光”

- 一 1981年吴家埠遗址 049
- 二 反山的发掘 052
- 三 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的发掘 068
- 四 “良渚遗址群”的提出 086
- 五 莫角山和“最早的杭州” 094

第四章 “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

一 城墙的发现	102
二 城内的考古工作	112
(一) 莫角山宫殿区	113
(二) 姜家山墓地	121
(三) 钟家港古河道	124
三 寻找外郭城	131

第五章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一 从“土垣”到“塘山”	150
二 高坝系统的发现	154
三 上帝之眼 CORONA——低坝系统的发现	159
四 水坝的发掘	162



Eighty Years of
Archaeology at Liangzhu

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

第一章 施昕更与《良渚》

一 吴越史地研究会

中国有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从北宋到清朝末年，金石学不断壮大，而金石学一直被误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己任的考古学，其实是 20 世纪从国外传入的一门学科。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兴起的。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对古代史料和古史传说的真伪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学者提出要建立科学的上古史，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和日本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纷至沓

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爱国主义热情。20 世纪 20 年代，李济^①、梁思永^②等人相继从国外留学归来。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

① 李济（1896—1979 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的学者。李济 1918 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1920 年进入哈佛大学主修人类学专业，1923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1924 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1925 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1926 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1929 年年初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② 梁思永（1904—1954 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1923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 年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对中国田野考古走上科学的轨道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先后主持和参加的重要发掘有：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遗址、城子崖遗址和两城镇遗址，安阳殷墟和侯家庄商王陵区，以及后冈遗址等。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起，因肺结核症加剧，长期卧床休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床上主持日常工作，为该所的建立和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年 10 月派董作宾^①到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调查和试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②

1921 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③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发

① 董作宾（1895—1963 年）：中国现代甲骨学家。1923—1924 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5—1927 年，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28—1946 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历任通信员、编辑、研究员及代理所长等职。1928—1934 年，曾 8 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由他主编的《殷虚文字甲编》（1948）和《殷虚文字乙编》（1948—1953）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第 1~15 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 13047 片。

② 陈星灿：《历史和现实双重变奏下的中国考古学》，《社会科学报》，2015 年。

③ 安特生（Andersson, Johan Gunnar, 1874—1960 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14—1924 年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1926—1939 年任瑞典远东古物馆馆长。1937 年再度来中国调查四川等地的冰川。1939 年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完成有关中国考古的著作。安特生在中国任职期间，着重于新生代地质的研究，后来逐渐转移到考古学方面。曾调查周口店化石地点，成为发现北京人的嚆矢。他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还在甘肃、青海发掘了大批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遗址，把以上的发现分为齐家、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卡约）和沙井文化，并推测它们的绝对年代。安特生是较早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学者之一。由于受到方法论和考古资料的局限，曾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分期问题做过不正确的判断，又曾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但是在中国考古工作的发展上，安特生是有贡献的。

掘，发现了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①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附近的城子崖遗址发现了以磨光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些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1931年，梁思永发掘了山东城子崖遗址，并撰写了《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此后，梁思永又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存的时间先后，第一次明确了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历史时期遗存的相对年代。这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使黄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工作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建立起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对峙的学说。

与此同时，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随着常州淹城、

① 吴金鼎（1901—1948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龙山文化的发现者。早年肄业于齐鲁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李济的指导下攻读人类学专业。1930年年初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1933年去英国伦敦大学颜慈教授处留学，其间曾随考古学家F. 皮特里去巴勒斯坦进行田野考古实习，1937年获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期间，先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后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吴金鼎曾参加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和浚县大赉店遗址等处的考古发掘，并先后主持云南苍洱地区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的发掘。他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是1928年在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遗存。



卫聚贤

湖州钱山漾、金山戚家墩等遗址的发现开始了。1930年，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卫聚贤等人在南京栖霞山焦尾巴洞、甘夏巷西岗头及土神侧找到3处出土石器及几何印纹陶片的地点，卫氏认为这是江南石器时代的遗物，从此揭开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①

1934年，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的慎微之在湖州钱山漾遗址采集了石镞、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及石犁形器等遗物。1935年，卫聚贤

①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慎微之

等人又在常州淹城、金山戚家墩发现了几何印纹陶器，这引起了学界对浙江史前文化更大的兴趣。^①

随着常州淹城、湖州钱山漾、金山戚家墩等遗址的发现，江南地区古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人士的关心和重视。以卫聚贤为代表的史学家开始筹划建立一个学术性的社会组织来更好地统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考古活动，即吴越史地研究会。

①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